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黄小兵[1]，黄静波[2]

（1.赣南师范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2.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消费行为；群体异质性；农民工；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F326.6；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5)02－0037－13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务工，国家统计局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6894 万人，比上年增加 633 万人，增长 2.4%，《时代周刊》曾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评述发生在中国的农民工进城现象。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 73111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62961 万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53.7%，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尽管如此，在城市化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挑战，从国际经验看，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后的定居一般是同时发生的[1]，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定居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而且大多数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并不会选择在城市定居，这些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相关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了 2.89 亿人，“户籍城镇化率”仅为 35.7% 左右。大量“候鸟式迁移”的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形成“二元社区”[2]，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3]。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更不利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使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个人总是选择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消费[4]，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事实上是一种传统生活方式

收稿日期：2015－01－29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5.02.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6200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J130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2014005)。

作者简介：黄小兵(1980—)，男，江西吉安人，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E-mail：huangxiaobing1234@126.com

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 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消费水平为 1345 元，比上年增长 22%，而当期全国城镇居民月平均消费水平为 1500 元，全国农村居民月平均消费水平为 787 元。在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为 589 元，占 44%；居住支出为 345 元，占 25%；交通、通讯和娱乐支出为 312 元，占 23%。

到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会导致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在保留农民工原始消费特征的同时越来越接近城市居民消费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在消费结构方面,居住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主体地位,但文体娱乐方面的消费所占的比重逐步提升;三是在消费行为方面,呈现出城市节约型消费和返乡"炫耀性"消费的两栖消费特征。①

韦伯指出特定的生活方式表现于消费商品的特定规律,因此,消费行为可以影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在此背景下,以群体异质性视角,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有益于深化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科学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加速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1. 社会融合的界定

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如何实现相互融合既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帕克就开始研究来自欧洲的移民在美国社会的融合问题。

Park and Burgess 认为社会融合是群体相互渗透的过程,通过某个群体形成对其他群体的情感、记忆和态度,然后产生交流,促使各个群体逐渐实现融合[5]。Seeman 认为社会融合是指不同群体建立和保持的一种社会关系或网络,这关系或网络是个体与社会发生关系桥梁的,进而实现社会融合[6]。

社会学对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多元论和同化论两大流派。多元论强调新移民不会完全摒弃原有的价值观念,认为他们也会在移入地接受新的文化和观念,适应当地社会环境,兼收并蓄,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秩序。同化论认为本地文化占据优势主导地位,外来文化处于劣势地位,认为移民必须改变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接受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实现融合。

人类学家在研究中更愿意使用"涵化"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 Berry 的涵化策略理论,他认为同化和融合具有显著差别,在同化中移民是在放弃了原有社会的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获得了移入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而在融合中,新旧两种文化特征被移民兼收并蓄,都会对移民产生影响。

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层次和维度

戈登最早系统划分了社会融合,他认为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结构融合、婚姻同化、认同性融合、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公共事务融合。国内有学者认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是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的过程,经济基础的建立是融合的前提,然后经过文化接受和习惯适应,最后达到对自身城市身份的认同[8]。

在衡量社会融合程度的指标选取方面,魏万青和陆淑珍把社会融合分解为身份认同、购房意愿、未来发展意向三个综合性指标,通过获得三个指标的综合因子得分衡量社会融合[9]。任远等选择的指标包括自我感知的社会态度、与本地人的互动、对城市的态度以及身份的认同等四个维度[10]。而张文宏和雷开春从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四个方面衡量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11]。悦中山、李树茁和费尔德曼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分为三个重要维度,包括:家乡文化保持的态度、现代性及对当地语言的掌握[12]。除了以上研究之外,迁入地语言的掌握是衡量移民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13]。身份认同也是心理融合的一个重要维度[14]。

3.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15]、职业流动[16]、外出时间[17]；社会关系包括社会资本[18]和家庭成员情况[19]；经济因素包括收入[20]、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1]和城市房价和产业结构[21]；非经济因素包括制度因素[22]、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23]。

综合分析已有的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度方面，很多研究使用留城意愿等单一指标衡量社会融合，而一些采用综合指标衡量社会融合的研究则全部采用主观性很强的指标，缺乏客观性指标；二是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因素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研究都遗漏了农民工消费行为这个重要因素，且对调研数据质量没有进行合理评价，导致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三是几乎所有相关文献都没有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依照群体异质性进行比较研究，导致给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根据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使用第一手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制度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

三、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度与统计特征

1. 数据描述

调查小组于 2013 年 5 －8 月在原中央苏区的江西于都（县城和新陂乡）、兴国（县城、埠头和长岗乡）、赣州市和广东深圳、广州、河南郑州的企业抽取了农民工样本开展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剔除了作答、录入不合格的答卷，实际有效问卷为 869 份。其中 624 个农村户口数据，245 个城镇户口数据，数据见表 1。本文将农民工界定为在企业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员。

表 1　样本的基本特征（n = 869）

基本特征	属性	频数	基本特征	属性	频数
性别	男性	497 人（57.2%）	出生年代	70 前	91 人（10.5%）
	女性	371 人（42.7%）		70 ~ 79	184 人（21.2%）
户口性质	农村	624 人（71.8%）		80 ~ 85	256 人（29.5%）
	城市	245 人（28.2%）		86 ~ 90	185 人（21.3%）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80 人（9.2%）		90 后	152 人（17.5%）
	初中	356 人（41.0%）	在城市务工、生活的时间	不到 1 年	65 人（7.5%）
	高中	256 人（29.5%）		1 ~ 5 年	298 人（34.3%）
	大学及以上	173 人（19.9%）		6 ~ 9 年	199 人（22.9%）
婚姻状况	未婚	277 人（31.9%）		10 ~ 15 年	170 人（19.6%）
	已婚	566 人（65.1%）		15 年以上	135 人（15.5%）
	其他（如丧偶）	22 人（2.5%）	月收入（元）	2000 元及以下	171 人（19.7%）
从事的行业	工业	301 人（34.6%）		2001 ~ 3000	314 人（36.1%）
	农业	108 人（12.4%）		3001 ~ 4000	261 人（30.0%）
	服务业	231 人（26.6%）		4001 ~ 5000	70 人（8.1%）
	其他	220 人（25.3%）		5001 以上	45 人（5.2%）

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度

已有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测量标准。在此次实证调查中，将尽量选择客观因素衡量社会融合，放弃了农民工是否自认为其为当地居民等较为主观臆断且难以测量的因素。根据多数学者前期的研究成果，参考了 Zagefka 和 Brown “家乡文化保持的态度”量表[24]、

Bollen 和 Hoyle“感知融合”量表[25],将任远的社会互动量表[10]纳入衡量社会融合的维度。同时借鉴魏万青的研究[9],将“成家立业”(包括购房意愿和未来发展意向)纳入衡量社会融合的维度。因此,本文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度包括社会距离,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社会互动、成家立业5个维度。

调查问卷中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度包括16个问项,可以将它们归纳为5个维度,为了更好地获取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对由16个问项构成的社会融合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而且并不限定析出因子的数量。分析结果显示KMO指标为0.726,Bartlett’s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说明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数据结果显示具有五因子的潜在结构,五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能够解释62.458%的总体变异,因此确定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稳定因子为5个。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的测度按照经百分制转换过的5个维度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进行计算。①

表2 社会融合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1	2	3	4	5
社会距离	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	**0.814**	-0.068	0.042	-0.053	-0.059
	我不属于这里	**0.805**	0.070	0.014	-0.042	-0.015
	我觉得自己是外地人	**0.742**	-0.062	0.016	-0.108	-0.008
	我在这里生活很困难	**0.709**	0.016	0.013	0.024	-0.029
文化融合	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对您来说是重要的	-0.041	**0.866**	0.052	0.155	0.124
	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对您来说是重要的	0.083	**0.819**	0.169	0.031	0.074
	遵守家乡的风俗习惯对您来说是重要的	-0.081	**0.789**	0.031	0.106	0.137
心理融合	您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	0.021	0.092	**0.811**	-0.064	0.033
	我觉得我是城市的成员	0.088	0.057	**0.752**	0.110	-0.003
	我把自己看作是城市的一部分	-0.072	0.014	**0.740**	-0.076	0.110
	我感觉我是属于城市的	0.057	0.103	**0.549**	0.292	0.034
社会互动	我会说一些本地话	-0.107	0.092	0.004	**0.775**	0.128
	我觉得和本地人交流不会感到受歧视	0.043	0.128	0.122	**0.719**	-0.008
	我平时和本地人相互交往比较多	-0.152	0.039	0.001	**0.561**	0.331
成家立业	我会考虑在城镇买房	-0.046	0.109	0.079	0.160	**0.859**
	未来我会考虑在城里定居发展	-0.025	0.212	0.083	0.127	**0.838**
可解释变异百分比		**20.641**	**15.733**	**10.871**	**8.571**	**6.641**
可解释变异累计百分比		**20.641**	**36.374**	**47.245**	**55.817**	**62.458**
内部一致性系数		**0.774**	**0.704**	**0.799**	**0.565**	**0.736**

通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社会融合量表进行信度②分析,除了社会互动的信度在0.565,其余各变量的信度都在0.7以上,总体信度为0.830,说明该数据基本满足要求。

① 特别要说明的是,由于5个维度中的社会距离和文化融合两个维度采用否定式问项,其得分值越高,代表社会融合程度越低,本文将它们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即将得分值为1分与5分互换,2分与4分互换,3分不变,数据处理后,两者的得分越高,代表社会融合程度越高。

② 信度指测量结果(数据)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在实证分析中,学术界普遍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数据的可靠程度。

建构效度①中，使用 SPSS18.0 对所有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值为 0.796，并通过 Bartlett's 球体检验 $P<0.000$），因子分析显示各变量共同度均大于 0.5，并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组合信度 0.795 接近 0.8 的标准。平均提炼方差 64.362%，大于 0.5 的标准，这表明数据基本满足效度的要求。

3.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统计特征

表 3 是农民工社会融合整体及分情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从整体情形看，农民工社会融合平均值为 3.22（中位数为 3），这表明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不高，这与以往许多学者研究相吻合。从社会融合的各个维度看，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程度仍然比较低，特别是农民工文化融合的平均值最低，这进一步说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整体水平比较低。数据发现，农民工的成家立业得分最高，反映了农民工虽然融入程度不高，但是定居城镇意愿强烈，有积极的融入动机。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整体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收入		务工年限	
		男	女	老	新	低	高	低	高	长	短
社会融合	3.22	3.23	3.20	3.27	3.19	3.16	3.31	3.12	3.25	3.19	3.28
社会距离	2.76	2.86	2.72	2.84	2.73	2.74	3.17	2.69	2.85	2.78	2.73
文化融合	2.37	2.42	2.33	2.44	2.32	2.45	2.32	2.27	2.39	2.39	2.34
心理融合	3.17	3.25	3.14	3.22	3.15	3.08	3.18	3.11	3.18	3.13	3.20
社会互动	3.14	3.16	3.11	3.19	3.11	3.30	3.12	3.04	3.31	3.13	3.14
成家立业	3.62	3.83	3.45	3.63	3.60	3.41	3.64	3.47	3.64	3.58	3.65

注：老一代农民工指生于 1980 年以前，新生代农民工指生于 1980 年及以后；受教育程度高指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受教育程度低指仅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或者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低收入指月收入在 2000 元及以下，高收入指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务工年限长指在城市务工 5 年以上，务工年限短指在城市务工 5 年及以下。

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总的社会融合程度，还是社会融合的 5 个维度，男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均高于女性农民工。从年龄结构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体及其各个维度的社会融合程度均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这与魏万青、陆淑珍[9]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受教育程度分析，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特别是在成家立业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的意愿，尽管如此，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更加愿意与当地的城市居民互动。从收入分析，收入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呈现正向相关关系，收入越高的农民工更能融入到城市。最后，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间的增加，虽然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在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上稍微比务工时间短的农民工，但是在社会互动、心理融合和成家立业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融合，所以务工年限的长短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不明确。

四、模型设定及实证结果分析

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为了深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和相关的研究，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① 效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问卷中问题的设置都是借鉴以往该领域研究成果，因此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SI_i = \beta_0 + \beta_1 age_i + \beta_2 gen_i + \beta_3 edu_i + \beta_4 tim_i + \beta_5 inc_i + \beta_6 con_i + \beta_7 lei_i + \beta_8 mar_i + \beta_9 ins_i + \beta_{10} sr_i + \varepsilon_i$$

其中,因变量 SI_i 即社会融合,自变量中 con_i 为消费行为变量,在针对全体农民工和分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使用消费水平作为消费行为的代理变量;在分情形的研究中,将农民工消费行为分为节俭型消费、理性型消费、冲动消费和炫耀型消费。在调查问卷中,关于农民工不同的消费行为设置了不同的问项,其中,节俭型消费行为问项包括:节俭是一种美德、我要多省点钱为以后打算;理性型消费行为问项包括:消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工作特点、休闲娱乐消费也是有必要的;冲动型消费行为问项包括我赞成超前消费、买东西主要看自己喜不喜欢,不在乎价格、买的东西越多越幸福;炫耀型消费行为问项包括:我很在意商品是不是名牌、花钱越多越体面、在外人面前花钱要舍得、请客吃饭要讲排场、买昂贵的商品可以让别人另眼相看。所有问项均包含 5 个选项:完全不同意 =1,比较不同意 =2,中立 =3,比较同意 =4,完全同意 =5,将不同类型消费行为问项得分分别相加并平均,得分越高代表其越符合此种消费行为特征。

上式中,age_i 为年龄,gen_i 为性别,edu_i 为受教育程度,tim_i 为在城市务工时间,inc_i 为收入水平,mar_i 为婚姻状态,ins_i 为制度质量①,lei_i 为休闲活动参与,sr_i 为社会交往范围,β_0 为截距,ε_i 为误差项。表 4 给出了变量含义及样本情况。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采用经典最小二乘回归。由于调查问卷数据库是横截面数据,基本可以不考虑序列相关问题。同时,对于多变量模型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低,可以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了控制估计的异方差问题,执行 Breusch - Pagan 检验异方差,拒绝了模型无异方差的零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因此,所有模型都是采用稳健的最小二乘估计的估计结果。表 5 给出了农民工社会融合及其各个维度的估计结果。

表 4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70 前 =1,70 ~ 79 =2,80 ~ 85 =3,86 ~ 90 =4,90 后 =5	3.13	1.23
性别	男 =1,女 =0	0.56	0.49
婚姻	未婚 =1,已婚 =0	0.31	0.46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1,初中 =2,高中 =3,大学及以上 =4	2.59	0.91
务工时间	不到 1 年 =1,1 ~ 5 年 =2,6 ~ 9 年 =3,10 ~ 15 年 =4,15 年以上 =5	3.00	1.21
收入	2000 元以下 =1,2001 ~ 3000 =2,3001 ~ 4000 =3,4001 ~ 5000 =4,5000 以上 =5	2.42	1.06
消费水平	800 元以下 =1,801 ~ 1200 =2,1201 ~ 1600 =3,1601 ~ 2000 =4,2000 以上 =5	2.65	1.40
休闲活动参与	经常参加 =1,不会参加 =0	0.44	0.49
制度质量	户籍、教育和养老 3 个问项得分的平均值	3.65	0.71
社会交往	没有 =1,偶尔 =2,一般 =3,较多 =4,很多 =5	3.33	1.12

① 制度质量问项有:户籍制度改革很有必要、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必要改革以及现行社保养老制度不能给我带来实际帮助,选项包括完全不同意 =1,比较不同意 =2,中立 =3,比较同意 =4,完全同意 =5,被访者对 3 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为完全不同意,那么表明当前的制度质量很好,如果回答为完全同意,则表明制度质量很差。为了研究的方便,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即将得分值为 1 分与 5 分互换,2 分与 4 分互换,3 分不变。因此,本文依据此 3 个问项得分的平均值对制度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越高,代表制度质量越差

表 5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 OLS 回归结果

	模型 1 社会融合	模型 2 社会距离	模型 3 文化融合	模型 4 心理融合	模型 5 社会互动	模型 6 成家立业
年龄	−0.048***	−0.071*	−0.132***	−0.051*	−0.011	0.02*
	(0.017)	(0.036)	(0.027)	(0.034)	(0.022)	(0.034)
性别	0.063*	0.353***	0.018	−0.036*	0.13***	−0.159
	(0.034)	(0.072)	(0.055)	(0.069)	(0.045)	(0.069)
受教育程度	0.09*	0.049*	0.005*	0.075**	0.043*	0.057*
	(0.018)	(0.039)	(0.029)	(0.037)	(0.024)	(0.037)
务工年限	0.003	−0.08	−0.054	0.082	0.011	0.058*
	(0.015)	(0.031)	(0.024)	(0.03)	(0.019)	(0.03)
婚姻	0.086**	0.036**	0.175***	0.21**	0.014**	0.071**
	(0.042)	(0.088)	(0.066)	(0.084)	(0.054)	(0.084)
收入水平	0.26***	0.144*	0.02*	0.033*	0.035*	0.11*
	(0.017)	(0.037)	(0.028)	(0.035)	(0.023)	(0.035)
消费水平	0.024**	0.026*	0.016*	0.045*	0.054***	−0.018**
	(0.012)	(0.026)	(0.02)	(0.025)	(0.016)	(0.025)
休闲参与	0.08**	0.117**	0.042	0.023	0.100**	0.121
	(0.031)	(0.066)	(0.05)	(0.064)	(0.041)	(0.063)
制度质量	0.175***	0.154*	0.11***	0.069*	0.068**	0.072*
	(0.022)	(0.047)	(0.036)	(0.045)	(0.029)	(0.045)
社会交往	0.145***	0.082***	0.049**	0.165***	0.41***	0.183***
	(0.014)	(0.029)	(0.022)	(0.028)	(0.018)	(0.028)
常数项	2.434***	3.156***	3.291***	1.721***	1.546***	2.471***
	(0.126)	(0.266)	(0.201)	(0.254)	(0.165)	(0.254)
样本数	798	801	799	801	801	800
R − squared	0.555	0.574	0.552	0.588	0.403	0.48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首先，分析整体社会融合的实证结果发现，消费行为因素显著为正，说明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水平，消费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这是因为消费是认同的显现[4]，个人总是选择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消费，身份可以通过消费方式表现出来，消费方式是进行身份建构和维持的重要手段[2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行为越来越接近城市居民消费特征，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这种转变会促进农民工对其在城市“市民”身份的认同，增加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关于分维度的社会融合研究发现，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的缩短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同时对文化融合和社会互动都会起到显著积极作用，但是对农民工在城市成家立业这个维度的社会融合产生不利影响，因为面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较低的收入和较高的消费水平会削弱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从而降低农民工在城市成家立业的动力和能力。另外，消费行为的估计系数值较小，仅为 0.024，这表明消费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产生的作用不强，一是因为囿于较低收入，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消费结构依然以必需品支出为主，原始的消费行为特征依然占主导

地位;二是因为消费水平对农民工成家立业的消极影响弱化了其对社会融合的积极作用。

在农民工个体特征因素方面,年龄因素高度显著为负,这表明年龄越小的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越低,这与年龄大的农民工比较成熟稳重的性格和较长时间的城市工作生活有关,这两种因素导致了年龄大的农民工职业更加稳定,社会融合程度更加强,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成为传统式的农民,也不能适应并融入农村生活,他们回到农村的"代价"很高,因此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性别因素显著为正,说明男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强于女性农民工,这与之前的统计特征得到的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农民工的家庭责任更大,他们更想改变家庭的命运,因此他们愿意选择在城市发展;受教育程度因素显著为正,代表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成正比,这与统计分析结论和其他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10],这种现象源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并且更希望后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务工年限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它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这符合统计分析的结果;婚姻因素显著为正(以已婚为参照组),表明未婚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已婚农民工,因为由于配偶和子女在原居住地,已婚农民工在情感上非常依赖这种"强关系"[27],而且,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在城市无法获得教育资源使得他们对融入城市"望洋兴叹",进而会削弱在城市的社会融合,而未婚农民工却没有这种关系的束缚,更愿意融入当地社会。

在经济因素方面,收入因素高度显著为正,表明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正相关,因为收入越高,在城市的生活和居住环境更好,对"市民"身份的认同感也会提高,因而会促进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

在社会关系因素方面,休闲活动参与因素显著为正,说明休闲活动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工作生活单调枯燥,而参与休闲活动可以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积累本地社会关系资本,增加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进而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社会交往因素高度显著为正,可见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会提升其在城市的融合度,其作用机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民工的"初始"交往范围越广,越有利于降低搜寻工作的时间和成本,并加速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二是农民工"本地"社会网络越广,从本地社会获得的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越多,有益于提高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制度质量因素高度显著为正,说明户籍、教育和社保等制度的完善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最关切的利益在于后代的教育和自身的社会保障,而户籍本身与教育和社会权益息息相关。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平等,成为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综合分析,在所有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因素中,收入水平、制度质量和社会交往是最重要的三类因素。而其他因素的估计系数均非常小,说明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虽然显著,但是影响程度有限。

最后,分析社会融合各个不同维度的实证结果,婚姻、受教育程度、制度质量、社会交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6种因素的结论并没有改变。有改变的是,年龄因素对社会互动影响不显著;性别因素对文化融合和成家立业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女性农民工在保持传统风俗习惯以及在城市定居意愿没有差异;务工年限对成家立业的影响非常显著,说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间越长,越希望在城市安居乐业。

3. 消费行为对不同群体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

为了探索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差异性,对不同农民工群体进行了实证研究,群体分类标准包括代际和性别。表6给出来了相关的实证结果。

表 6　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实证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老一代	新生代	男性	女性
年龄			−0.033*	−0.026*
			(0.023)	(0.027)
性别	0.041**	0.095**		
	(0.063)	(0.044)		
受教育程度	0.041**	0.12***	0.045**	0.064**
	(0.037)	(0.023)	(0.026)	(0.028)
务工年限	0.005**	0.01	0.018	0.013*
	(0.026)	(0.02)	(0.022)	(0.022)
婚姻	0.154*	0.058*	0.119***	−0.03*
	(0.142)	(0.042)	(0.06)	(0.062)
收入水平	0.19***	0.21***	0.227***	0.184***
	(0.03)	(0.023)	(0.025)	(0.028)
消费水平	−0.004	0.031*	0.034***	0.019**
	(0.0244)	(0.016)	(0.016)	(0.021)
休闲参与	0.054	0.09 *	0.079**	0.02**
	(0.058)	(0.04)	(0.046)	(0.046)
制度质量	0.113***	0.164**	0.169**	0.133***
	(0.039)	(0.029)	(0.031)	(0.035)
社会交往	0.08***	0.092***	0.126***	0.034***
	(0.025)	(0.018)	(0.019)	(0.022)
常数项	2.319***	2.505***	2.396***	2.787***
	(0.202)	(0.139)	(0.175)	(0.202)
样本数	235	564	444	354
R − squared	0.508	0.569	0.524	0.55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首先分析消费行为对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消费水平对新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会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由于成长的时代环境和外出务工经历迥异，两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代际差异[28]，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依然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的消费方式，表现为为家庭积累财富而尽量降低在城市的消费水平，生存资料消费在消费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种传统消费行为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较低的社会融合程度是相符的，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现代性的市民化消费特征，表现为较高的消费水平，不断增加的个人享受和发展的支出，追求品牌的炫耀型消费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类似城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农民”身份的否定以及成为城市消费者和生活者的愿望，因而会促进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合。

其次分析消费行为对不同性别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消费水平对两类农民工社会融合均会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是从估计系数的大小判断，消费水平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要强于女性农民工。这是由于女性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存在就业层次低、工作更替频繁和培训机会少等

困境,女性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比男性农民工低[29],这导致女性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要低于男性农民工。① 另外,从消费行为看,尽管女性农民工出现趋向城市消费习惯的偏好[30],但是低收入和保守性格使得女性农民工依然保持较强的传统性,她们的消费依然以生存资料的消费为主,即使在精神娱乐消费方面,她们的消费也是节俭务实的,而男性农民工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同时他们更希望通过炫耀性消费获得身份认同。因此,女性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城市适应性不如男性农民工。

4. 不同类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将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分为节俭型消费、理性型消费、冲动消费和炫耀型消费。表7给出了相关的实证结果。

表7 不同类型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节俭型消费	0.075			
	(0.193)			
理性型消费		0.048***		
		(0.117)		
冲动型消费			-0.026**	
			(0.0355)	
炫耀型消费				0.023
				(0.035)
年龄	-0.029**	-0.029**	-0.03**	-0.03**
	(0.018)	(0.018)	(0.018)	(0.018)
性别	0.04*	0.039*	0.042*	0.042*
	(0.037)	(0.037)	(0.037)	(0.037)
受教育程度	0.04***	0.03***	0.05***	0.02***
	(0.02)	(0.02)	(0.02)	(0.02)
务工年限	0.022	0.02	0.021	0.02
	(0.016)	(0.016)	(0.016)	(0.016)
婚姻	0.096**	0.095**	0.093**	0.092**
	(0.045)	(0.045)	(0.045)	(0.045)
收入水平	0.18***	0.184***	0.196***	0.19***
	(0.019)	(0.019)	(0.019)	(0.019)
休闲参与	0.073*	0.062*	0.05**	0.06**
	(0.013)	(0.013)	(0.013)	(0.013)
制度质量	0.165***	0.145***	0.17***	0.157***
	(0.024)	(0.024)	(0.024)	(0.024)
社会交往	0.09***	0.089***	0.089***	0.088***
	(0.015)	(0.015)	(0.015)	(0.015)
常数项	2.492***	2.489***	2.458***	2.517***
	(0.136)	(0.136)	(0.137)	(0.136)
样本数	751	751	751	751
R-squared	0.75	0.75	0.78	0.7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1$

① 调查问卷中,女性农民工的月消费水平的均值为2.5,月消费水平大约为900元,而男性农民工的月消费水平的均值2.8,月平均消费水平大约为1200元。女性农民工月消费水平在800元以下的占23%,801~1200元的占43%,1201~1600元的占20%,1601~2000元的占10%,2000元以上的仅有4%。

分析表 7 的实证结果可知，节俭型消费行为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节俭型消费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因为节俭消费的农民工大部分属于传统农村温饱型消费，他们在城市务工并省吃俭用的目的在于保障将来返乡后的生活，这部分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原始身份，社会融合的动机很弱，因此他们的消费行为不会对其社会融合产生显著影响。

理性型消费行为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且估计值在四种消费行为中最大，说明理性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会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一方面，面对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职业的不稳定性，理性消费的农民工会根据自身的收入、工作特点和社会环境进行合理消费，这会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长期稳定性，进而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理性的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更具有城市适应性，他们不仅注重生存质量，更加关注个人发展，这种消费行为更加符合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特征，这无疑会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

冲动型消费行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冲动型消费行为会削弱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这是因为冲动消费的农民工往往没有储蓄，甚至是透支消费，具有这种消费行为特征的农民工注重消费行为带来的短暂满足感，但是它会极大地伤害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和稳定性，从而对其社会融合产生消极影响。

炫耀型消费行为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不明显，与冲动消费的农民工不同，炫耀消费的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民”身份，通过高消费获得心理上的“市民”身份认同，因而他们具有很强的融入当地社会的动机。但是，这种消费行为本身又与冲动型消费行为一样，会损害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生存的能力，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环境，正反两种力量互相作用，导致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不明确。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不同群体的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来自江西、广东和河南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及休闲活动参与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特别是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程度比较低，导致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距离较远，社会互动较少，但是农民工的在城市成家立业的愿望比较强烈，具有较强的融入动机。

第二，统计与实证分析显示，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其他因素方面，新生代、男性、未婚、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更高，同时收入水平、休闲活动参与、社会交往和制度质量均与农民工社会融合正相关，在所有的因素中，收入水平、制度质量和社会交往是最重要的三类因素。

第三，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消费行为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均会产生促进作用，但是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要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会显著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而冲动型消费行为会显著削弱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节俭型消费行为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

消费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一是要努力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例如住房成本，提高农民工消费水平；二是要积极引导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鼓励农民工增加教育消费。制度质量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因此，破除户籍、教育和社保制度的藩篱，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让农民工平等分享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才能切实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其次，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民工社会融

合的最关键因素,一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要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社会交往的重要性排在第三位,要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需要通过社区、工会、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共同努力,为农民工举办交流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帮助农民工积累当地社会资本。休闲活动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因此,首先,政府要监督并鼓励企业进行人性化管理,合理确定工作时间和强度,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和条件;其次,政府部门要大力增加公共休闲娱乐的场所和项目,并尽量降低休闲设施的使用成本。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致使其文明程度和道德素质还无法达到城市要求,因此,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等方式,以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不断提升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1]尉建文,张网成.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9-13.

[2]周大鸣. 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07-112.

[3]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4]王 宁. 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 社会学研究,2001,(1):12-13.

[5]PARK R E,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6]SEEMAN T. Social Ties and Health:The Benefits of Social Integration[J]. Annals of Epidemiology,1996,(5):442-451.

[7]BERRY J W. A Psychology of Immigr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1,5(3):615-631.

[8]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9,33(1),17-30.

[9]魏万青,陆淑珍. 禀赋特征与机会结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2,(1):13-21.

[10]任 远,乔 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2010, 34(2):11-20.

[11]张文宏,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8,(5):117-143.

[12]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12,(1):1-11.

[13]MYERS D,GAO X,EMEKA A. The Gradient of Immigrant Age at Arrival Effects on Socioeconomic Outcomes in the U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9,43 (1):205-229.

[14]NESDALE D, MAK A S. Immigrant Acculturation Attitudes and Host Country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Community&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0,(6):483-495.

[15]吴兴陆,亓名杰. 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探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5,(1):26-33.

[16]胡小江,南 方,郭元凯.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J]. 同济大学学报,2014,(4):51-60.

[17]李 强,龙文进. 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54.

[18]戚迪明、张广胜.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2,(4):66-71.

[19]姚 俊.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调查——基于苏南三市的实证分析[J]. 城市问题,2009,(9):96-101.

[20]钱文荣,黄祖辉 . 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1]李珍珍,陈 琳. 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2010,(5):3-10.

[22]孟颖颖,邓大松. 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2011,(1):74-82.

[23]章 铮. 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 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7):21-29.

[24]夏怡然.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10，(3)：35 - 44.
[25]ZAGEFKA H，BROWN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Relative Fit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Immigrant - majority Relations in German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2，(2)：171 - 188.
[26]BOLLEN K A，HOYLE R H. Perceived Cohesion：：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J]. Social Forces，1990，(2)：479 - 504.
[27]姚建平. 消费认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8]申　鹏，凌　玲. 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J]. 农村经济，2014，(2)：35 - 40.
[29]向华丽. 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 3 市的调查[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3，(1)：103 - 110.
[30]张　晶. 趋同与差异：合法性机制下的消费转变——基于北京地区青年女性农民工消费的实证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0，(6)：58 - 64.

Consumption Behavior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UANG Xiao-bing，HUANG Jing-bo
(1. *Research Center for Central Soviet Area*，*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341000，*China*；
2. *School of Lingnan*，*SUN-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of consumption behaviors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group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not high，although they have intense integration desire. The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can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ignificantly. The paper discovers that consumption behaviors will only affect migrant workers of new generation，and will generate stronger impact on male migrant workers tha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Eventually，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can aggrandiz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but，ir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will undermin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effect of frugal and showy consumption behaviors is not notable.

Key Words：consumption behaviors；group heterogeneity；migrant workers；social integration